

文章编号: 1008-603X(2002)03-0082-08

# 南京历史文化的时空解读

王永亮

(南京邮电学院 社会科学部,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 文化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南京处于沟通长江中下游、黄河长江下游的枢纽位置, 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时空中, 南京历史文化是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融合进程催生的, 南京历史文化的兴衰则是与两大河流的文明交融和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节律联系在一起的, 并且最终成为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北而南、由西而东格局变化的结穴。

**关键词:** 南京; 历史文化; 文化时间; 文化空间

**中图分类号:** G07 **文献标识码:** A

## 一、文化与文化时空

文化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创造, 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文化时空既是文化形成的背景又是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的机制。

文化是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产物, 文化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也体现在文化时间和空间中。时间的自然属性是指自然界的各种持续不断的变化过程, 时间的社会属性是指文化在时间长河中形成的历史, 也就是文化的社会历史进程。空间的自然属性是指特定地域的自然特点及位置关系(地理关系), 空间的社会属性则是指文化区域边界的伸缩变化, 也就是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文化传播、交流、冲突与融合相互关系。

时空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展现了特定文化与时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 时间指称的是一种纵向的变化关系, 空间指称的是一种横向的位置关系。特定的时空是文化的背景和前提, 时空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作用, 从外部为文化的生成、发展和演变界定了大致的范围。马克思将自然条件分为两大类, 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 并指出: “在文化初期, 第一类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较高的发展阶段, 第二类富源

具有决定性意义。”<sup>[1](P.560)]</sup>但是文化不是时空的机械产物, 文化作为人的创造又创造了特有的可能时间和可能空间领域, 时空又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尚书·禹贡》记载: “禹敷土, 随山刊木, 奠高山、大川。”大禹治水, 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划定九州。这一传说正好揭示了文化与时空的双向关联。

对特定地域文化的时空分析不仅可以窥见文化发生的背景, 而且可以深入解释特定地域文化的根源和特点。本文把南京历史文化时空进一步区分为外部时空和内部时空加以分析, 所谓外部时空是指南京历史文化区域外的时空特点, 主要分析南京在中国历史文化时空中的特点及所受影响; 所谓内部时空是指南京历史文化区域内部的时空特点, 即南京区域自身的时空特点。

## 二、南京历史文化空间解读

### 1. 南京历史文化的内部空间

#### (1) 内部自然空间: 山水格局

明人曾说, 江南山水始于江南, 盛于南京。坦率地说, 南京的山、水在江南并不十分突出, 但南京的山与水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风水家心目中的风水宝地, 对南京的赞美历代有之。著名的传说是诸葛亮驻马清凉山, 说“钟山龙蟠, 石头虎踞, 此帝王之宅。”(晋张勃《吴录》)明末顾炎武认为, 天下为都者, 莫过于北京、南京二地。“天下山川形势, 雄伟壮丽, 可为

京都者,莫逾金陵。至若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扼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燕蓟。”(《日下旧闻考》)孙中山先生也说:“南京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建国大纲》)

在中国传统风水家眼中,风水宝地当是天地人和谐、充满生气的所在。好“风水”,简单说要能“藏风得水”,群山环绕利于避风,水流屈曲利于聚气。山为骨架主富贵,水为血脉主财运。三面环山,水口紧缩,中间微凹,山水相伴,朝抱有情便是较为完整的微观地理环境。南京的山水格局历来为风水家关注,金陵、秦淮、秣陵皆得名于风水。

南京的地形特点是丘陵、平原相间分布,以低缓的丘陵为主。南京的北面沿江一带以及东郊、南郊有起伏的低山丘陵,对市区形成三面环抱的形状,西北向长江敞开,一环碧玉缺城西。在传统的风水学说中,有一种理想的风水模式,即四神、四灵地模式。四灵地模式从传统气象推演而来,东方青龙蜿蜒、北方玄武垂头、南方朱雀翔舞、西方白虎驯俯。南京前有朱雀(前湖)、后有玄武(后湖)、左青龙(钟山龙蟠)、右白虎(石头虎踞),恰好构成了四灵地格局。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成为古来人们对南京自然环境的赞美。不过,也有对南京风水持异议的,如明代就有人认为南京“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周漫士《金陵琐事》)梁启超说:“建都北方者,其规模常弘远,其局势常壮阔。建都南方者,……其规模常清隐,其局势常文弱。”<sup>[2](P.244-266)]</sup>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代,在多数情况下是建都南方者败于同时代的建都北方者。看来金陵王气与亡气的交织,还是亡气占了上风。

无论如何,宁镇山脉来龙有势、发脉悠远,屏障罗列、远近有致,穴场分明、穴形多样,为南京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舞台。从更大范围的南京地区来看,南京地处江苏最大的低山丘陵区,江苏最主要山脉中的三条分布其间:江北的老山山脉,市区的宁镇山脉和溧水县东部的茅山山脉,同样构成了拱卫之势。四面重重拱卫的格局,加之长江天堑作为天然防线,使得南京城形势险要、气象雄伟,成为可攻可守可居可游可玩的所在。

## (2)内部人文空间:山水刚柔

人文空间依托于自然空间,既是南京历史文化的舞台,也是南京历史文化所塑造的空间。南京的内部人文空间可以概括为“三山二水”,三条龙脉、两大水系。但是它们对于南京历史文化的意义不可等

量齐观。

所谓“三山”,是指宁镇山脉西翼以东北—西南走向分三支楔入市区或切近边缘。北支沿江的龙潭、栖霞、乌龙、幕府、狮子山,面江一线断层悬崖陡壁、临江而立,是城北的天然屏障。其中幕府山在南京历史上被视为江防要地,燕子矶是南来北往的重要渡口也是军事要津。中支由宝华、龙王、灵山逶迤而来,自紫金山西延入城,形成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鼓楼岗、五台山、清凉山等低山丘陵,在城内形成隔断市区的天然分界线,南属秦淮河水系,北属金川河水系。自六朝至今,南京历史文化始终都是背靠这一线开展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清凉山(石头山)、紫金山可分别看着是南京历史文化的开端和结束。南京的山不以雄奇或秀美闻名,但南京却以石头城著称,正因为这中路山系是南京历史的中心舞台的缘故,是文化塑造了自然空间的缘故。南支有汤山、青龙山、黄龙山、方山、祖堂山、牛首山、凤凰山,是南京的南面防线,谢安静弈克强敌、岳飞大战金兀术等历史故事就发生在这一线。

所谓“二水”,指长江和秦淮水系。南京城里还有金川水系,但除了南京历史文化发生意义外,金川水系的文化内涵远不及秦淮水系,且金川水系在南京历史文化中线的主山系之北,又与市内秦淮水系勾联一体,故不再单列。长江与秦淮对南京的文化意义是不同的。长江是南北文化的一道屏障,也是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南京在大江之滨,所以有人称南京为“江城”。但“江城”远没有“石城”为人所知或认同。南京历史文化上的长江,曾演绎过无数悲壮的故事,偏安王朝都曾以长江天堑来续写历史,南北统一也曾以长江天堑来撰写壮歌。晋室南渡后,贵族们在江边的新亭对泣便是长江与南京历史文化的一种象征(今水西门广场建有新亭遗址)。秦淮河则是另一番景象。秦淮河发源于句容和溧水,两源自方山汇合北流到南京城下,在通济门外分为两支:“内秦淮”穿行城内,这就是闻名的“十里秦淮”;“外秦淮”绕过城南。两河在水西门汇合,1000多年前在莫愁湖附近注入长江。十里秦淮之于南京犹如十里洋场之于上海一样,是各自城市的象征。有人曾指秦淮文化绝非青楼文化,把秦淮文化看成了南京的“文化渊薮”大加褒扬。究其实,内秦淮自古为南京工商文化繁盛之地,其文化印记正是六朝贵胄金粉、明清娼家脂粉,至今仍是娱乐购物之地。秦淮文化自非等于青楼文化,但说秦淮文化是商业、文化发达催生的以才子佳人为代表的文化也

许是合适的。本文不探讨秦淮文化,对此先放下不提。此外,莫愁湖、玄武湖被称为金陵明珠,分列秦淮河的左右两侧,也带有水的性格。

山刚水柔,秦淮的富庶繁华与中路山系的“六朝旧事随流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李白《月夜金陵怀古》)如今,九余里秦淮依旧是江南佳丽地,五百年江山只留得金陵帝王冢。江刚河柔,秦淮万古多情水,历明清六百年而不衰的秦淮灯火与长江的落寞凄切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南京的历史文化气质是近秦淮而远长江的。秦淮文化成为南京文化的代表,有障人耳目之嫌,可谓“唯见秦淮胭脂色,不见长江滚滚流”,但又的确是南京人文空间的事实。

## 2. 南京历史文化的外部空间

### (1) 中国文化空间概要

与世界其他区域的文化空间相比,中国文化具有领域广大、腹里纵深、风貌多样的空间特点。复杂多样的地理空间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一总多元的格局。

在中国文化空间的版图上,东西、南北向形成了多个具有不同特色的区域空间。就东西向而言,按地理特点可自西向东分为三级阶梯,青藏高原为第一级阶梯,青藏高原外缘至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之间为第二级阶梯,东部的平原和丘陵为第三级阶梯。按照经济形态,以黑龙江流域的爱晖到云南腾冲为界线东西可分为两大部分,即东部的农业文化区和西部的游牧文化区。

就南北向而言,最为显著的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界定的自然空间。长江流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的差异是人们公认的一种事实,大略以长江为界的南北文化区域的划分是人们评价我国人文差别的一种最简明的分类。

长江、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中国文化空间的角度说,长江黄河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既是贯通融合各自流域东西向文化区域的枢纽,又是相互交汇形成中国文化整体风貌的关键。“中国文化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由强大的双源汇成的。”<sup>[3](P.45)</sup>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长江与黄河两大河流碰撞的结果,两大河流的碰撞贯穿了中国文化的全程,并且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比如中国哲学传统是由根基于黄河文明的儒家和根基于长江文明的道家耦合而形成的,思想史上的道教兴盛与禅宗发达都与长江流域文化特点有着决定性的关联。<sup>[4][5]</sup>再比如中国文学传统是由南方的

屈原传统和北方的诗经传统交汇而成,中国文学史上的诗骚之变、唐宋之争的根源都在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差异<sup>[6]</sup>。

中国文化在发生期堪称满天星斗,在历史长河中逐步汇聚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对中国区域文化的划分有多种,本文采用四大文化区系的划分来立说。一是以渭水和潼关以下黄河为轴线的“中原”区系(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关中文化);二是以滇北长江以下为轴线的南方区系(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滇黔文化、闽台文化);三是北方文化区系(西域文化、松辽文化、蒙古文化),这是隔中原而与南方文化相对应的地域概念;四是青藏高原区<sup>[7](P.6-8)</sup>。

### (2) 南京在中国文化空间中的位置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籍于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sup>[8](P.2)</sup>同样,长江文化所依凭的也是其流域的各条支流。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长江支流秦淮河两岸,紧邻长江。就东西而论,南京位于中国的农业文化区;就南北而论,南京属于南方长江文化区。

进一步说,南京文化处于长江流域的吴越文化与荆楚文化之间,北与黄河流域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相望。需要说明的是,区域文化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区域文化之间往往存在着一条宽阔的中间地带。比如齐鲁文化与吴越文化之间的淮河流域就是这样的中间地带。淮河流域文化区域,大体上北界陇海铁路,南濒长江,西至湖南、河北两省省界,东达江苏北部沿海。在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安徽、江苏两省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sup>[3](P.255)</sup>。淮河流域常常是我国南北文化的比较明显的分界线。中国文化中心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淮河流域都是处于两者的过渡地区。古战场遍布淮河流域,著名的“垓下之战”、“淝水之战”、“采石大战”都发生在淮河流域。

南京地理环境的特点不利于它成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但在全国范围内却表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sup>[9](P.701)</sup>。南京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区位,就横向来说,介于吴越文化与荆楚文化之间,可谓非东非西、亦东亦西。从长江、黄河文化关系来说,南京可以说是两大河文明张力作用下的产物。长江自九江以下呈西南—东北走向,进入南京境内急转向东,南京处在长江大转弯的顶端,成为距离中原地区最近的临江城市。南京本属长江文化的前沿,是南北文化交汇的中心。当南京成为北方黄河文化的退守地

时,它甚至又成为黄河文化的大本营。因此,就纵向来看,南京又具有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特点。

### 三、南京历史文化的时间解析

南京文化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是中国文化进程催生的结果,南京历史文化的性格也是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中获得的。有人说南京文化缺乏个性,其实原因正在于南京文化不象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区域文化那样经历过文化个性充分发展的阶段。对于南京文化来说,其内部时间(南京历史文化自身的发展进程)与外部时间(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几乎是完全重合的

#### 1. 中国文化的融合进程与南京历史文化

##### (1) 中国文化的融合进程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满天星斗般发生的中国文化,经由多元性的区域型文化内涵的集聚,展开了区域间和多区域的文化融合,贯穿中国文化历史的全程。在中国文化融合的进程中,有两条十分显著的线索。一条是农业区与游牧区的文化交融进程,另一条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化交融进程。

整个亚欧大陆的农业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带几乎平行地南北排列,两大文化的撞击构成了近代以前世界历史的主题。欧亚大陆上古时期、古典时期和中古时期的转折点,大体均起因于游牧部族的侵略活动<sup>[10]</sup> (P. 59)。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长江及其间的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地理分界线大略位于 400 毫米等降水线处,与保护农业文明的长城的位置和走向相近。在这个农耕区域的东、南、西面山水环抱的相对地理隔绝机制之外,北面却存在明显的大缺口。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民族互动关系的本质和归宿<sup>[11]</sup> (P. 29)。农业民族筑城自守在世界历史上几为通例。在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筑“拒胡”长城起直至清初,农业文化区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一直是中国文化交融的一条突出主线。秦汉时的游牧民族只限于骚扰边境,从南北朝到两宋则发展到游牧民族占据中原并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蒙元和满清两代则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了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

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侵袭,从消极一面看,是对农业文明的大规模摧毁,导致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退步,中国历史中的“五胡乱华”和辽夏金元都对

农业文明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但从积极一面看,游牧人的入侵不但促进了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交融,而且由于农业文明的边界被迫向南推移,也进一步促进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融。在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激烈冲突的两晋、两宋之际,恰恰成为包括南京在内的长江以南地区迅速崛起的关键契机。

三代以前两大河流分别出现了上中下游的文化区域<sup>[3]</sup> (P. 31—32),长江、黄河就开始了文化交融的进程。从传说时代到文明之初,以夏、楚二族为主体的南蛮文化发祥于巴蜀,商族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以东部沿海地区为摇篮,西北地区是孕育以周族为代表的戎狄文化的温床,形成了蛮、夷、狄三足鼎立的格局。长江汉水流域、黄河到汾水一带、黄河淮河之间是三大部族文化交汇的主要地域<sup>[14]</sup> (P. 21—32)。

西周的政治势力和文化扩张在长江流域还不十分显著,巴蜀、荆楚、吴越有了发展成为独立势力的机会。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大河流文化的交融主要在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之间进行。“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sup>[13]</sup> 到公元 3 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终于将各具特色的南北文化融为农业文化的一个大区域之中,当然南北融合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此后,长江文化一方面继续与黄河文化相互交融,另一方面又与黄河文化一道作为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甚至成为与游牧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前沿阵地。

中国文化的交融以上述两条主线为纬,纵向上大致经历了四次大的文化融合。先秦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经过夏商周三代,形成了华夏族和中国文化的雏形。秦汉魏晋南北朝为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大融合,极大地推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和发展。隋唐辽宋金夏为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大融合,形成了胡汉一家的文化局面。元明清为中国文化的第四次大融合,今日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最终形成。

##### (2) 中国文化融合进程中的南京历史文化

区域文化的发展一般可分为区域文化的萌芽阶段、方国时期、史志阶段等三个阶段<sup>[7]</sup> (P. 11—13)。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萌芽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30 万年前南京东郊汤山一带出现的猿人活动踪迹。距今约 1 万年前溧水回峰山一带出现了古人类的活动踪迹,距今五六千年前,在今天鼓楼西北的北阴阳营等地出现了南京的原始居民。距今约 3 000 年以前,南京地区的长江两岸、秦淮河流域、玄武湖滨普遍出

现了早期居民的村落。大约在中原的商周时代,秦淮河流域出现了以湖熟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与太湖流域的吴越文化核心区发生交往,而汇入了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区,南京地区处于吴越文化的边缘地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境内各区域文化频繁交流和融合的时期,南京文化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并萌生自己的文化个性的。公元前 6 世纪,吴国在高淳建固城,楚国在江北六合建棠邑。南京主城区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先后出现了几座古城。公元前 495 年,吴王夫差设冶城(今朝天宫一带);公元前 472 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命范蠡筑越城(今雨花西路西);公元前 333 年,楚威王灭越设金陵邑(今石头城)。这些城邑虽然只是军事据点且规模也都很小,但对南京的历史文化来说却意义非常,甚至可以说它们确立了南京历史文化的基调或基因。南京在长江流域的文化交融中的重要性,首要的是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而不是经济文化的发达。正是地处“吴头楚尾”的南京恰好成为吴越与荆楚争夺的焦点和联系的前沿。公元前 570 年的吴楚衡山(今江宁衡山)之战,正是在区域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展开的,今南京市区的城邑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六朝时是南京第一次大发展的时期,偏安江左的“六朝”创造了继汉开唐的文化高峰。吴大帝孙权“一代鸿图开建业”,先后将丹阳郡、扬州的治所迁到建业,最终于公元 229 年定都建业,使南京从一个落后的小县一跃成为国都和长江文化融合的中心。

西晋短暂统一,除了恢复秦汉时的南京地区建制并略有调整、新设临江县(后改名为江宁县)外,建业城并没有受到很大的破坏。东晋南朝虽与东吴隔西晋而前后相续,人们习称“六朝”,但两者对于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来说意义却完全不同。前者主要是长江流域区域文明的融合,长江流域上中下游逐步向融为一个整体发展<sup>[14]</sup>。而后者则主要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融合。一个显例是:在西晋末年以前江南是清一色的吴语方言区。西晋永嘉以后,南来移民达 90 万人,北方 8 人中有 1 人南迁,南方 6 人中就有 1 人是北方侨民。而苏、皖两省就占 43 万,江苏 26 万。建康至镇江一带的北方侨民比当地土著还多,北方方言已取得优势<sup>[15] (P. 29-30)</sup>。钱穆先生说,当时中国的南北两方,都进行着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的大工作<sup>[8] (P. 135)</sup>。正是在东西南北文化的先后两次 300 余年的大规模的融合之中,南京的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东吴时,建业与武昌一起跃进

江南地区的大城市行列;而经东晋南朝的发展,东南之首的建康城不再是单纯的江南城市,逐渐形成融合南北风格于一体的全国性大城。

隋唐以后,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整合为一体。作为东西南北农业文明融合的中心,南京开始面对游牧文化的冲击,成为宋金、宋元对峙的前沿阵地。

## 2.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与南京历史文化

### (1) 中国历史上的治与乱

严复曾说:“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sup>[16] (P. 2)</sup>。中国历史进程中明显存在着治一乱的周期交替,以致林语堂说: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成每八百年为一单位的周期。每个周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军事上却很强大的王朝开始,它使中国在几百年的内部纷争之后重新团结起来。其后,是五百年的和平,中间有一次改朝换代,接着是一系列的战乱。结果,首都从北方迁往南方。然后,北方与南方脱离,南北形成对峙局面,敌对情绪强烈。这时,外来民族入侵,整个周期便告结束,历史于是又开始重新循环。中国又一次统一在中国人手中。文化又开始繁荣起来<sup>[17] (P. 42)</sup>。这些循环周期包括:一、从秦始皇至六朝和鞑靼族入侵(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588 年),其间约 830 年;二、从隋朝始至蒙古人入侵(589~1367 年),其间约 780 年;三、现代周期,从明朝至今,周期还未结束。但是迄今为止已表明在过去的 600 年间,已经发生了许多与过去模式非常相似的事件<sup>[17] (P. 43-44)</sup>。此说未必圆满,但却点出了中国历史治乱和首都南迁的事实。

中国历史治乱交替的原因,在于内外社会周期与自然周期的叠加<sup>[11] (P. 15-39)</sup>。首先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矛盾的周期性循环。中国传统社会生产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小生产相结合的耕织经济为社会基本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安定、风调雨顺,具备适量的耕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时候,这种“农家乐”的田园生活便可正常运行。但这种“靠天吃饭”、“靠人吃饭”的家庭社会经济单位相对于自然灾害、土地兼并、人治秩序这些强大的外部力量实在是太脆弱了。其次是上文所说的农业文明区域外的游牧文化的强大冲击。

台湾经济学家翁之镛对公元前 221 年到公元 1951 年中国历代治乱循环分析,盛世 150 年,占 6.9%;治世占 13.2%;小休占 10.8%;衰微占 21.5%;乱世占 47.7%。盛世加治世不过 1/5,而乱世占近一半时间<sup>[11] (P. 36)</sup>。治乱与合分在中国历史上是两组相近的概念,乱世一般也表现为地方的割

据分治与王朝的更替。秦以前中国处于分治状态,秦以后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政权始终存在。有学者认为,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了81年。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的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之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sup>[18]</sup>(P. 100)。

## (2) 中国历史治乱与南京历史文化

南京历史文化的进程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天下太平强盛时南京往往趋于沉寂,而当天下大乱时却往往成为南京发展的良机。时势造英雄,而乱世往往成就了南京。

先看乱世中的南京。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南京历史文化的个性初露、东吴时建业的飞速发展是由于地接吴楚的区位优势,那么在秦汉一统后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交流之中,南京的地理和区位优势就越发显山露水。黄河流域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各种内外矛盾尖锐交织的中心。全国性战乱,北方历来是主要战场,南方一般只受短暂而有限的波及。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南北分裂局面,南方的政治中心基本都在南京,南京成为北方人力、物力和财力转移的中心。南京历史文化的峥嵘初显就出现在秦汉一统以后的第一个大的乱世魏晋南北朝时期。此后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衰微,黄河中下游地区饱经浩劫、残破不堪,大量居民南迁。唐末南唐立都金陵,改称江宁府。相对稳定的政局使得南京的经济文化和城市发展再度进入高潮期。南唐疆域,包括江苏、安徽大部、江西全部和福建的一部分,是十国中规模最大的国家,经济文化趋于繁荣。靖康之难使建康府在又一次文化大迁徙中获得新的活力,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此后全国性的南北长期对峙局面不再出现。

当然乱世给南京历史文化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南京获得了发展的契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成为南京发展的契机;另一方面也给南京带来了一次次毁灭性的打击。南京的各种别称多达百余个,在世界城市中绝无仅有,可见南京在历史上经受过的变故之多。南京城在历史上多次经受毁灭性的洗劫,如隋初、南唐末年、南宋末年、明末等等,举国罕见。

再看天下一统时的南京。天下一统的秦汉隋唐之时,都对南京采取贬抑的政策。秦始皇开凿秦淮

河以泄地气的传说是贬抑南京的一个象征。秦汉时南京地区设有秣陵、胡熟、丹阳、江乘县,县治均在今南京市郊,而上一级郡治则在今苏州、浙江、安徽等地。隋文帝杨坚下令将建康的城邑宫殿全部毁掉改作耕地。唐初把扬州州治迁往江都,极端时把南京这个南朝时100多万人口的我国最大城市只以一县的地位划归润州(今镇江)管辖。即便不采取贬抑的政策,因南京失去了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发展也趋于平缓。

## 3. 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与南京历史文化

### (1) 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

与文化融合、治乱更替相联系的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考古学的研究表明:黄河、长江两个流域,文明的起步是同时的。然而在新石器晚期,却发生了人口从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迁徙的情况。如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北移至河南中部,江苏青莲岗文化北移至山东。这是因为南方卑湿,森林沼泽遍布,难以开垦的缘故。在新石器晚期和铜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文明程度超过了长江流域。王夫之说:“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读通鉴论》卷十二)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自三代以下至西汉集中于黄河的中下游,关中和山东是两个高度的开发区,南方几乎等于空白。“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当时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状态,大片土地仍为原始植被所覆盖,只有太湖流域和绍兴地区农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且主要局限于山区。从六朝开始,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发生南移和东移的趋势。到东晋末年,东南地区“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晋书·食货志》卷二六)就南北而言,以五代为界,经济重心从北方转到南方。就东西而言,秦和西汉时期,西部的关中和巴蜀地区,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从东汉起,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均较上游为快,东西部经济大致平衡。隋唐时的经济重心实已东移,大运河的作用就在于把东部中国(包括华北和东南)的财富输往西部,以支持建立在关中的朝廷。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几乎全部依赖东南,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送陆歙州诗序》),后来杜牧更进一步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樊川文集》卷十六)宋以后,全国经济布局南胜于北、东胜于西的格局确立。宋代时已有“苏常熟,天下足”或“苏湖熟,天下足”之谚。明朝

初年,全国除南、北直隶以外,有13个布政使司,北方4个,南方9个,恰好与汉朝时相反,汉朝时候全国13个州,北方9个,南方4个。由此可见全国经济和人口布局巨大变化。

中国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地。到春秋战国时代,汉文化圈覆盖黄河的中游和下游流域,并向南北西三面扩展。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皆定都关中,东汉魏晋定都洛阳,中国政治中心均在黄河流域,并且呈现出由西向东迁移的态势。东晋南朝时期汉文化的政治中心在五胡十六国的挤压下被迫南迁,唐宋政治中心复建于黄河流域的西安、开封,再次由西向东迁移。唐亡后,政治中心不再建立于西部;宋亡后,政治中心在黄河流域的东西轴线迁移让位于东部地区(涵盖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南北轴线迁移。明清以来,尽管政治中心北移幽燕,但经济文化中心依然滞留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中国的文化中心伴随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也呈现出向江南迁移的趋势。从上古到秦汉,文化重心位于黄河流域的齐、鲁、关、洛等地。在晋人眼里,南人尚是中国之外的化外之民,“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全晋文》卷五四)东晋南朝时,南方江浙一带文化渐盛。隋唐时全国学术文化中心又回到长安洛阳,北宋时南北学术文化旗鼓相当,到北宋后期文化中心也完成了向江南的转移。宋室南迁后的近千年间,东南沿海地区始终是我国学术文化的重心地区。

## (2)文化中心转移与南京历史文化

南京历史文化是在中国文化中心由西而东、由北而南转移的节律中发展壮大的。南京本具有沟通长江中下游、黄河长江下游的区位优势,随着中国文化中心的东移南下,南京的区位优势迅速显露出来。

自六朝以来,由于下游的自然地理条件优于上中游,长江下游地区经济文化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南京虽地处吴越文化发达区的边缘,但横贯东西的长江是六朝时期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把上、中游的益、荆二州与下游扬州联系起来,由首都建康往河道密布的太湖流域与浙东地区,已由运河网贯通起来。地处这条东西交通运输大动脉上的建康,不仅是当时南方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且也是长江流域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货物的重要集散地,为东南第一都会、六朝金粉之地。

两大流域经济交流是中国古代各地经济交流中最大量也最重要的,长江下游因其独有的自然地理

优势而成为两河经济交流的主要场所,隋唐运河系统完成以后更是如此。但此时的南京与扬州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金陵由六朝“金粉”之地沦为“古丘”、“幽径”,广陵则从地方小镇、“芜城”跃居为“富庶甲天下”的全国著名的通都大邑。广陵的辉煌与金陵沉寂都与政治地位相关,金陵因政治贬抑而迅速衰落,隋唐三百余年间默默无闻。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政治力量阻止不了经济文化中心向长江中下游的转移,隋唐以来长江中下游已成为全国首富地区。到唐代中期,地扼东南的南京逐步繁荣起来。南唐时金陵已成为全国繁华的商业都会。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进一步南移,位于江南中心的南京成为我国江南枢纽、东南重镇,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大中心。

明代朱元璋定都应天府,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迁移的必然结果,也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画上了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统一王朝的首都,也是江南第一次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明初的洪武到宣德年间的洪宣盛世,绝大部分是以南京为中心号令全国而成就的。南京作为明初五十余年的首都和此后二百余年的留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史家评说:盖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北京)为其枢。并建两京,用东南之财赋,会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

## 四、结论:文化时空与南京历史文化的定位和特色

南京在历史上有过很多名称,“南京”的名称虽起于明初,但却是对南京历史文化时空的最好概括。“南京”首先含有文化空间内涵,“南”与“西”、“东”、“北”相对而称。中国文化史上确有“南京”、“西京”、“东京”、“北京”之称,虽不同时代有不同所指,但典型的是指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古都。这些古都的与时更替,又使“南京”这一名称中凝聚了文化时间的内涵。

南京处于沟通长江中下游、黄河长江下游的枢纽位置,内部山环水抱、形势险要。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时空中,南京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南京历史文化是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融合进程催生的,南京历史文化的兴衰则是与两大河流的文明交融和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节律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最终成为



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北而南、由西而东格局变化的结穴。

南京历史文化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还没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文化内涵时,就被裹挟进了中国文化进程的大潮。如果说,中国有特色的区域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段发展历程的话(如西安在唐代以后、北京在元代以前),那么南京的历史文化从头至尾都是属于中国文化进程的大潮的。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 [2] 梁启超. 中国地理大势论[A]. 饮冰室全集(第二册, 卷十一)[C]. 上海:上海中央书店, 1935.
- [3] 王会昌. 中国文化地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4] 葛兆光. 道教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5] 葛兆光. 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6] 萧华荣. 中国诗学思想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7] 李勤德. 中国区域文化[M].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 [8]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 [9] 许辉, 邱敏, 胡阿祥. 六朝文化[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 [10]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 吴象婴, 梁赤民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 [11] 张琢. 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12] 李炳海. 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 [13] 张正明. 楚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14] 许辉, 蒋福亚. 六朝经济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15] 周振鹤. 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 [16] 严复. 论世变之亟[A]. 严复集(第一册)[C].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17] 林语堂. 中国人[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4.
- [18] 葛剑雄.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M]. 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1994.



作者简介:王永亮(1966-),男,江苏南通人。南京邮电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学士、法学硕士。目前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德育及文化方面的研究。

## On the Cultural Time and Space of Nanjing History

WANG Yong-li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Culture is rooted in its time and space background. Nanjing is located in the key position that connects the middle reaches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and links the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and Yellow River.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Nanjing culture presented itself at the combination period of Wuyue Culture and Jingchu Culture, and drifted along with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cultural combination and the transfer of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As a result, Nanjing becomes the terminus of the transfer of Chinese history cultural center.

**Key words:** Nanjing; cultural history; cultural time; cultural space

(责任编辑:刘云)